



蒙哥马利元帅
回忆录

蒙哥马利元帅回忆录

〔英〕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著

郑北渭 刘同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MEMOIRS
OF
FIELD-MARSHAL THE VISCOUNT
MONTGOMERY
OF ALAMEIN, K. G.
Collins, London, 1958
根据伦敦柯林斯出版社 1958年版译出

蒙哥马利元帅回忆录

〔英〕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著
郑北渭 刘同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25 插页 2 字数 428,000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9,000册

书号: 3188·40 定价: (六)1.80元

出版说明

蒙哥马利元帅（1887—1976年）是英国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先任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于1942—1943年指挥北非战役击溃隆美尔的德军而闻名于世。北非战役结束后，他进军意大利，以后又率领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参加诺曼底登陆，转战西北欧，直抵德境。1944年9月升为元帅。1945—1946年任英驻德占领军总司令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英国代表。1946—1948年任英军总参谋长。1948—1951年任西欧联盟统帅。1951年起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副司令。1958年退休。

本书是他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从童年生活、军校生活、早期的军旅生活、婚姻和家庭生活，一直写到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副司令时为止。但以阿拉曼战役及其以后的军事、政治活动占极大的篇幅。由于蒙哥马利元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非洲战场阿拉曼战役的指挥者，在欧洲战场上又是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盟军领导成员之一，战后又出任英国和西欧联盟军队的要职，因而他在书中对战局，对英美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和大战末期与苏联的矛盾，以及对战后的国际局势和英联邦各国的关系等的记叙，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及战后冷战史的研究工作者来说，是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书中所引的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的信件，不少是他们两人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远征欧陆》）中所未载的。

本书原版于1958年出版。由于书中记叙了欧战中他与艾森豪威尔的战略之争（他指责艾森豪威尔延误欧战胜利达数月之久），并对英国军、政界某些人物和意大利将领作了一些议论和评

价，因而本书出版后曾在美、英、意等国引起很大的反响。书中某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如第三十二章所说：“……在远东，倘各国恐惧外来威胁的话，那是中国而非俄国。我们必须这样看待问题，并据此推行健全而一贯的政策。”1960—1961年，蒙哥马利元帅曾两次访问我国，对我国有较深刻的了解。他在1961年9月访问我国时提出了关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即：大家都应当承认一个中国；承认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应当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这是他对战后国际问题的看法的一大发展，也是对我国看法的一大转变。这三项原则当即赢得了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的赞同和支持。

本书原版有照片四十八幅，中译本只选择了其中历史价值较大的七幅予以复制。

本书前言至第十三章由郑北渭同志译出，第十四章至第三十三章由刘同舜同志译出。

前 言

写本书的目的并非为了个人著书立说，更不敢借此博得更多的声誉。实是多方建议有必要写这本回忆录，我才动手写的。我的目的在于让后代了解我对那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印象，并由此阐述一些我所认为我应据以思考和行动的原则。

本书的每一个字最初都是我亲自用铅笔写的。写好后，各章依次打字，再由三位可信赖的朋友过目。我尊重他们的意见。根据他们的评论与建议，我再逐章修改润色。最后，全书仍请这三位反复推敲，以求不枝不蔓，准确无误。

这三人中，首先是 E·T·威廉斯准将，现任牛津大学罗得斯学院院监——也就是本书常提到的比尔·威廉斯，多谢他抽暇审核本书并提出意见。

其次，也是本书常提到的詹姆斯·格里格爵士，他的评断和建议是宝贵的。最后一位是阿瑟·布赖恩特爵士，这位大历史学家花了不少时间审阅本书各章。

对以上三位，谨致深切的谢意。

我还感谢那些为本书打字和帮助编制地图和照片的人。我也要向容许我发表某些书信选录的人们表示谢忱。这方面若有任何疏漏，未及先期获致允准之处，在此谨表歉意。

我承认——本书的开场白即可见一斑——我常常是个好争辩的人。但是我的思想、行动与错误一如常人。在我的一生和行动中，我的准则为其他人所不容，也许为世所不容。但我的准则一直是我内心所确信的，是我的责任与良心。我认为正确的，就决不讳言，并坚持我的信念。这经常给我带来麻烦。我不打算在这本书里回

答对我的各种评论，而只想根据我的见解尽可能简单地叙述我所经历的漫长、愉快的军事生涯。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袍泽描述了他们在那些岁月里的经历，本书所写的则是我的经历。

我力图在本书说清楚那些我认为重要的事情，并尽量把内容局限于本人所知的第一手材料。本书也许缺乏文学作品的风格，但我希望它以真实性见长。

陆军元帅 阿拉曼的蒙哥马利

1958年9月于汉普郡奥尔顿的伊辛顿磨坊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童年	1
第二章 我的早期军旅生涯	8
第三章 两次大战之间	23
第四章 1939年英国参战	31
第五章 敦刻尔克撤退后的英国陆军	52
第六章 我的指挥原则	65
第七章 第八集团军	76
第八章 阿拉姆哈勒法之战	93
第九章 阿拉曼之战	104
第十章 从阿拉曼到突尼斯	131
第十一章 西西里战役	165
第十二章 意大利战役	187
第十三章 进攻欧陆之前，我在英国的时日	208
第十四章 诺曼底战役	251
第十五章 盟军在塞纳河北岸的战略	267
第十六章 阿纳姆战役	290
第十七章 阿登战役的前奏	302
第十八章 阿登战役	310
第十九章 欧战结束	320
第二十章 德国投降	338
第二十一章 略论战时为将之道	351
第二十二章 对战后德国的管制：第一步	358

第二十三章	和俄国人的纠纷开始	378
第二十四章	重建德国的斗争	391
第二十五章	在德国的最后一些日子里	409
第二十六章	去白厅就任前的序曲	418
第二十七章	在白厅工作的初期	430
第二十八章	1947 年的海外之行	444
第二十九章	巴勒斯坦风云	465
第三十章	我成了白厅中讨厌的人	475
第三十一章	欧洲防务合作的开端	496
第三十二章	西方的团结	504
第三十三章	重新考虑后得出的一些想法	527

第一章

童年

我于1887年11月17日出生在伦敦肯宁顿区板球场圣马克教区牧师寓所。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在他所著的《马尔巴勒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第一卷中，谈到某些人的不幸的童年。他写道：“某些人早年生活中的艰难逆境，厄运灾难所引起的痛苦，蔑视和嘲笑刺激，形成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天生的智慧。而没有这些品质，就很难完成伟大的事业。”

确实，我可以说我本人的童年是不愉快的。这是由于我母亲同我在意志方面的冲突引起的。我的早年生活充满了激烈的斗争，而在这些冲突中，我母亲总是胜利者。我一不在，她就会嚷道：“快去看伯纳德在干什么，叫他停下来。”我经常挨棍打，但这些不断的惩戒怎么也没有制服我。我得不到两个兄长的同情；他们柔顺听话得多，容易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我的姐姐的倔强劲仅次于我，我从她那里得到不少帮助和同情；但是麻烦大体上得由我一个人忍受。我从不掩饰我的过错；接受一切处罚。母子双方都显然有错。就我而言，虽然我过早就从生活中知道恐惧，但我所受的这一切的实际结果也许是有益的。要是我那倔强不羁的性格不加以抑制的话，我可能会使某些人感到更加无法容忍。不过，我经常怀疑母亲那样对待我是否过分了一点；是否应该如此管教，我也是怀疑的。

我认为我们的家是一个普通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我的母

亲十四岁订婚，于 1881 年 7 月和我父亲结婚，那时她刚刚读完书。结婚后一个月，即 1881 年 8 月 23 日，她度过了十七岁生日。我父亲当时是肯宁顿区板球场圣马克教区的牧师。我母亲于婚后也立即作为一个伦敦牧师的妻子，投身于各种繁忙的宗教活动。

他们很快就有了孩子。从 1881 年到 1889 年生了五个孩子。1889 年我父亲被任命为塔斯马尼亚^①的主教，当时我母亲还不到二十五岁，已是五个孩子的妈妈了。我排行第四。隔了七年，她在塔斯马尼亚连生了两个，过了五年仍在塔斯马尼亚又生了一个男孩。我最小的弟弟布赖恩，是在我们离开了塔斯马尼亚回到伦敦以后出生的。

这样我母亲一共生了九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子，刚到塔斯马尼亚不久她即死去了。我的一个弟弟死于 1909 年，当时我正在印度步兵团服役。于是留下七个孩子，我们七个今天都还活着。

这个大家庭好象还不够大似的，我们总是有其他的孩子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肯宁顿圣马克教区，寄居我家的有三位远房堂表兄弟，他们的父母都在印度；搬到塔斯马尼亚后，这三位堂表兄弟从英格兰赶来，因为他们体质虚弱，需要塔斯马尼亚的新鲜空气。当我们从塔斯马尼亚返回伦敦后，还总是有别人和我们一起生活。

对我母亲来说，既要应付作为一个伦敦牧师的妻子或主教夫人的工作，又得花费时间照料她的孩子以及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孩子，实在是不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在家里实施严格的纪律，这样可使她有时间在教区或主教管区尽她首要的职责。她对我们孩子定下了明确的规矩；这些规矩必须服从；倘有违反立即惩罚。要是家规不这样严峻，要是母子间多一些亲切的温暖，也许对我会发生较好而截然不同的效果。我的兄弟姐妹并不那么难弄，他们容易管教得多，不添什么麻烦。我是家里的一个坏孩子，

① 塔斯马尼亚(Tasmania)，澳大利亚联邦的一个州。——译者

一个反叛者，这样就使我很早就认识到好歹都要靠自己。我们年长的兄弟姐妹从未觉得家庭是和睦的。也许弟妹们与我们感觉不同，因为我母亲随年龄的增长，性情逐渐和善起来了。

这奇特的家庭环境确也起了某些好的作用。我们都循规蹈矩，全家都无可非议。我们之中没有人上过法庭或进过监狱，也从没有人诉诸法院要求离婚的。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个毫无生趣的家庭。这看法也许是对的，如果这是我母亲治家目标的话，那她毫无疑问已达到目的。但就我们五个年长的兄弟姐妹说来，这个家庭总是对年轻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缺乏亲切的了解。在我看来，弟妹们的情况要好些，可能是我母亲把精力都集中在对付她的大孩子们特别是我的缘故。不过，总起来说，我母亲是个很能干的妇女。她的性格十分坚强，为人严肃。她有她的一套治家方法。她教导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说真话。就我所知，她的孩子中没有一个人曾做过使她丢脸的事。当我还是孩童的时候，她使我畏惧。到我长大了，她已不再行使她的权威，于是畏惧之心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尊敬之情。从我从军一直到我母亲去世，我对她那极好的品行怀有无限和不断增长的尊敬。我明白我早年的淘气主要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

现在想来，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的儿童时代的感情和爱全都倾注给我父亲是不足为奇的。我崇拜他。对我说来，他总是象一个朋友。如果世上真有圣贤，那就是我的父亲。我母亲总是硬要他按她的意思办事。母亲掌握全家经济，她每星期给我父亲十先令，这些钱还得包括他每天在“文艺协会”午餐的费用，如果一星期未到他央求母亲再给一两先令的话，他就会被严厉地盘问。可怜的好人啊，我想他最后几年一定过得不愉快。他想干些什么，从未被准许，也得不到关心和护理，要不然的话，他也许可以多活几年的。当他瘫痪的时候，我母亲亲自照料他，但她不善于护理。我父亲于1932年逝世。当时我正在埃及指挥皇家沃里克郡团第一营。父亲

的去世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人是我的父亲，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当我父亲于1932年去世时，我万万没有想到五年以后，我的妻子又长辞人间，离我和我的儿子而去了。

我们于1901年底从塔斯马尼亚回国。1902年1月，我哥哥唐纳德和我入伦敦圣保罗学校读书。当时我十四岁，毫无学校生活的经验。我在塔斯马尼亚所受的教育是由英国来的家庭教师传授的。我的学识很少，实际上毫无文化修养。在当时英国人的心目中，我们是“殖民地居民”。我能象鱼那样善于游泳，体格也十分强健；不过对于英国学校中盛行的主要球戏诸如板球和橄榄球，我却一无所知。

入学后，我猛攻体育运动，只三年多点时间我即成为第十五橄榄球队和第十一板球队的队长。在学业方面，我的成绩都不显著。

我的英语成绩评语如下：

1902年 作文很差。

1903年 作文差。

1904年 写作很差，不能作文。

1905年 写作尚可；该生文章明达，但无文体观念。

1906年 颇佳。

如今我敢说我的英语表达至少是清楚的；我所说的话，人们可能不同意，但他们至少都能理解。也许我错了，但我认为我的表达是清楚的。人们也许会不明白我所做的事，但我愿打赌，他们决不会不明白我所说的话。至少他们相当了解那些他们所不同意的东西。

我在圣保罗学校呆了三年之后，校方的评语说我是个与年龄不相称的落后学生，还加上：“该生要上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把握不大，必须努力学习。”

这一评语对我是个相当大的震动。很明显，如欲在军队中获

得差使，我必须潜心学习。我正是这样做了。我毫无困难地中途考进了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如果你要学点东西的话，那么圣保罗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以我为例，一旦我明确了目的与要求后，我的师长们就来教导我，对此我将永远感激他们。我在圣保罗学校过得很快活。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第一次领略了什么是领导，什么是权威。对这两者，我都以有限的见识热切地抓住它们并行行使过，虽说可能有些笨拙。在圣保罗学校，我第一次计划我自己的战役（在橄榄球场上），那儿常有一些激烈的竞赛。当时，我同时代的人中，有的评论我的战术是特殊的。下面我引用一篇登载在1906年11月学校杂志上的文章。我得解释一下，我在圣保罗学校时的绰号是“猴子”。

我们不平凡的历史专栏

一号：“猴子”

“这头机灵的动物，穿着球衣，以橄榄球场和其他这种可去的地方为家。它强悍凶狠，精力无穷，邻近的动物见之害怕，因为它会把它们的头发拔掉。这叫做‘擒抱’。经常可以看到它同它们一伙，一阵短跑，用一股动物的蛮劲，把一只椰子扔来扔去。它对异族决不留情，踩踏它们的脑袋，拧着它们的脖子，并且用许多难以想象的手段对付它们，目的无非是要证明它那颗爱国之心。

要猎取这头动物，是很危险的。它疯狂地直向你冲来，从不稍停，手里抱着椰子，由其中一个伙伴陪伴着。正当倒楣的运动员想干一家伙时，椰子却传给它的伙伴了。这位扑空的好猎手还未弄清情况时，这两头动物早已过去了。

因此，大家还是不要猎取这头猴子为好。即便逮住了，也不见得好吃。它以食炸面饼圈为生。如果决心不听这个忠告，猎人最好先把自己头皮剥掉，免得被做成肉卷。”

在那些日子里，我没有多少零用钱。我的父母很穷；家里人又

多。我们兄弟得不到多少零用钱。但我们也够用了。我们从小就懂得钱的份量。

我在十九岁时离开了圣保罗学校。在那儿度过的年月，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在那儿，我体验到了社会生活的初步经验，这在家里是不可能得到的。对于一个孩子说来，学校在性格、习惯、品质上的影响，应该是最主要的，至于在智育和体育发展方面的影响，那倒是第二位的。在公立学校中，要比在预科学校或私立学校中更为自由；危险在于男孩子容易把自由与松散等同起来。在我拿到成绩不好的报告单为之震惊之前，我本人就是这样，分不清自由和松散。圣保罗学校在我的性格上留下了烙印。我离开学校时颇为依依不舍，但对失去童年感，我却并不那样眷恋。学校生活尽管愉快，它无非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生活展现在眼前，对我来说，下一步是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当我成人了，我就抛弃童性稚气”——总得多少如此。

我就于1907年1月去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事学院。

一些人在回顾他们的童年时，毫无疑问地会提出一些应该改进的地方。以我为例，简单地说在两方面颇感欠缺，而这两者都是由于我母亲掌管家庭父亲退让所致。第一，在我幼时就知道恐惧，渐渐蜷缩到我自己的小天地之中，自我奋斗；这无疑对我后来性格方面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第二，在把我送进一所大型公立学校时，并未对我阐明生活方面的某些基本知识，我只能在无秩序的学校生活中而不是通过家庭的教育，开始去体会和学习，最后直到我十九岁去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事学院为止。此种疏忽，也许造成了不良后果，但幸运的是，我并不这样认为。即使如此，我也不愿类似情况发生在别人身上。

当我到伦敦求学时，我已学会独自行动，成败自负，成为一个自我满足、无视权威的、经得起惩罚的人。

在我离开学校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开始渗透到我的头脑中，

那就是：生活是严峻的斗争，一个男子汉应该经得起冲击和挫折。倘欲成功，必须具备许多条件，其中有两条是最关键的：即艰苦的工作和绝对的正直。至于宗教对人生的关系，对我来说，那时还不明显。我父亲曾经期待我能够成为一个牧师。但这未能实现，当我告诉他，我想当一名军人时，我清楚地记得他的失望情绪。他没有试图劝阻我，他接受了这件他认为是必然的事。如果他今天还在世，我想他一定会说这条路走对了。假如我再有一次生命，我也决不会作其他选择，我仍愿当一名军人。

第二章

我的早期军旅生涯

在1907年，要进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必须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先是检定考试，通过考试以显示考生在智力方面的某种最低标准，这是必需的。一年或一年多以后再进行竞争性考试。我顺利通过了这两种考试，在竞争性考试中，我在约一百七十名考生中名列第七十二。事后我才惊奇地发现，许多同学为了确保在竞争性入学考试中获得成功，都认为有必要早日离校，到一个考试补习班去补课。

在那个时候，陆军并不吸引全国出类拔萃的学生。陆军生活开支相当大，靠个人薪金实无法维持。一般认为，甚至在所谓不大讲时髦的郡团里，一个士兵的收入或津贴每年至少需要一百镑才能维持生计。在骑兵和较新式的步兵团中，要求一个士兵在被接受之前得有三百镑至四百镑的收入。当我决定以军事作为我事业方向的时候，我并不了解这些经济事务；也没有人向我或我父母讲起过这些事。在桑赫斯特，当各人必须考虑选择各自的团的时候，我才弄明白这些事，但那时学业已进行到一半了。

平民子弟在桑赫斯特每年的费用为一百五十镑，这包括食宿和一切必要的花费。但是额外的零用钱也属不可少的。经过一番商量，我的父母同意每月给我两镑，假日照给，这样，我个人的收入一年有二十四镑。

我怀疑其他许多同学是否跟我一样穷，但是我还是过得去。在那些日子里，手表刚开始出现，学院小卖部就有手表出售；大多数